

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

Zhang, Xiaotong; Wang, Hongyu; Zhao, Ke

Published in:
Forum of Northeast Asia

Publication date:
2013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Zhang, X., Wang, H., & Zhao, K. (2013). 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 *Forum of Northeast Asia*, 2013(1), 91-98.

Copyrigh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s) or other rights holders to whom publication rights have been transferred, unless permitted by a license attached to the publication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or other), or unless exceptions to copyright law apply.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infringes your copyright or other rights, please contact openaccess@vub.be, with details of the nature of the infringement. We will investigate the claim and if justified, we will take the appropriate steps.

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

张晓通 王宏禹 赵柯

[摘要] 中国近年来并未因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在对外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反而在国际政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成为了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愈加尖锐的矛盾。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未充分利用,没有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受阻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因此,只有明确国家利益,综合运用大战略和策略,加强内部协调和对外战略机制建设,经济实力才可能得以有效运用和发挥。

[关键词] 权力;权力转换;经济实力;经济外交;实力资源;国内进程;战略;联系战略;大交换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3)01-0091-(8)

[收稿日期] 2012-11-01

[作者简介] 张晓通(1978-),男,江苏南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王宏禹(1982-),男,黑龙江依安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29);赵柯(1980-),男,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在中国现实的经济外交实践中,存在着愈来愈尖锐的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之间的矛盾。以中美关系为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上升,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明显发生有利于我国的变化,但中国却并没有享受到因为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本应拥有的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的主动地位,反而面临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更为咄咄逼人的攻势,处理中美关系也较以往更为棘手。类似境遇也出现在中欧关系当中。“实力上升”与“处境变差”这一矛盾局面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该如何破局?

这里面既有西方对中国防范和遏制上升的一面,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经济发展,重视增强国家实力,但却忽视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即如何盘活这些实力资源,实现既定的对外经济和外交目标。实力不等于影响力,也不等于结果。实力再多,如果不加以运用和转化,以达成具体目标,那这些实力只是呆实力、死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实践中没有现实意义。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达到了顶峰,但它的这种经济优势没有被转化成为与之等量的政治或外交影响力。与日本相似,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拥有较多的经济实力,但似乎尚未充分利用,精彩发挥。有鉴于此,本文拟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实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的使用效果。

一、实力运用的国内进程研究

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具有丰富实力资源的国家,并不总能得到它预期的结果。实力资源与预期结果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中间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其实质是将实力资源组织起来并投入使用;二是国内和国外两个进程,即战略实施效果的好坏要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进程的检验。换言之,实力资源能否最终派上用场,达到目的,要看战略和进程这两个重要环节,用公式表示就是“结果=实力资源+战略+进程”。

什么是战略?金德尔伯格曾将“权力”定义为“能够被有效运用的实力”,也就是“权力=实力+有效使用实力的能力”。这里的“有效使用实力的能力”就是“战略”,即将实力有效地组织起来达到某一项具体目标。^[1]在这一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其强调综合使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巧实力”概念以及有目的的使用所有权力资源和工具以达到国家目标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都是典型的战略理念。

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悖论是,即使一国具备了丰富的实力资源和明确的战略,结果也未必得偿所愿。古典决策模式,即理性模式,假定决策者能及时获得充分而正确的情报与信息,并对环境条件与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有关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在最后抉择时能选择一个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获利最大、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最佳方案和行动计划。但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实际情况是:一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所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对内外部环境的判断多少有一些主观色彩,决策或多或少有一点唯意志论的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战略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甚至事与愿违的原因。美国是拥有超级实力禀赋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也频繁运用多种战略和战略组合,倡导和运用“软实力”和“巧实力”。但美国政府在救助欧洲、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完成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时遭遇强大的国内阻力,致使其力不从心,在诸多问题上事事不顺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明确提出要多用于绿地投资,^①购买国外先进技术等优质资产,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困难重重。是什么原因使得实力资源及其运用不能直接推导出权力结果?为什么融合了资源取向和运用取向的权力概念还是不足以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无法预测和解释结果?这对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导向型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权力概念的研究还应当以“结果”为导向,增加一个“过程”或者说“进程”取向,用公式表示就是“权力结果=实力资源+运用(战略)+进程”。这里所说的“进程”,不是指实力资源运用的战略或策略,而是指行为体在运用实力资源,即实施战略时需要经过国内进程的检验,才能产生最终的权力结果。国内进程就是一国的内政,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及国内利益关系的互动过程。

在国内进程“游走”时,既有的实力资源可能出现损耗。实力资源有如油气管道中的油气,长途运输到达目的地前必然出现损耗。在国内环节的损耗主要源于国家不同目标之间的竞争、不同利益群体诉求日趋多元化、不同政府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追求的目标不尽相同、民众自主和维权意识上升以及各种不同思潮的碰撞。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强调的是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国内利益攸关方对一国对外政策制定者或谈判人员的影响。^[2]双层博弈的复杂

^① “绿地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主体所有的企业。其形式有二:一是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设立的独资企业;二是设立的合资企业。

性在于,一国政府的决策既要能被本国国内接受,同时又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其他国家政府也要考虑本国国内接受的可能性。所以,在国际谈判中,国内层次的博弈至关重要。^①由此可见,在实力资源运用的过程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决策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国内和国外两个进程。归根结底,就是互动双方或多方各自的国内进程。一个好的决策者和一个好的战略实施必须考虑到实力资源的运用结果不是线性的,在产生最终结果前必然接受国内进程的非线性塑造。之所以有了丰富的实力资源和精明的战略布署却依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答案只能从国内进程中去寻找。这也是本文强调的实力运用需要加入进程研究才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现实的原因。

二、实力运用的分部门研究

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现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实力领域都是“全能”。即使是美国,也不是各部门实力资源的“全能冠军”。美国在军事实力领域是全球霸主,但在经济领域则不是。就经济总量而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超过美国。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经济实力,分析经济实力的运用,就为我们开启了对实力资源进行分部门研究的大门。对实力资源分部门、分领域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实力资源的运用问题将更为复杂,但也更为有趣。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是不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性的问题,即一国能否倚仗其在某一问题领域的实力资源推动解决其在另一问题领域的关切,其实质是将一个问题领域的实力资源输出到另一个问题领域,以及是什么原因阻挠不同部门实力资源的搭配使用。对实力资源流动性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在讨论的权力转化问题,即某一领域的权力资源能否转化为另一领域的权力资源。

实力资源有如江河之水,有时会遇到闸门大坝,影响实力的发挥。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去,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把自己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主导各类组织和问题的地位。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总体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 and 军事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的结果相符。因此,世界政治被视为无缝之网”。^[3]而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这种相符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变小了,世界政治不再是无缝之网。意思是,武力等政治安全领域的实力资源无法轻易流入到经济领域,世界政治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议题领域的不同结构共同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有这个结构的权力分配。在此背景下,实力资源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流动变得较以前困难。

造成实力资源流动困难的原因在哪里?在很多情况下,军事、政治手段与经济手段协调使用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也是开展总体外交的要求。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往往是某一局部利益,如经济利益的牺牲。因此,不同实力资源能否搭配既是一个涉及实力资源运用的战略问题,同时也需要经过国内进程的检验。举例而言,“政经结合”、“以经促政”或者“以政促经”都是战略,其实质是将有限的各部门资源组织起来,服务于设定的具体目标。而具体采用上述哪种战略又是一个进程问题,涉及不同机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以最终决定是政治服务经济,还是经济服务政治。所以说,使用何种资源以及如何搭配是涉及实力运用整个流程的重大问

^① 艾利森决策三模式中有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官僚)政治模式。前者指决策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做出选择;后者指政府各部门领导人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最后决策是竞争、妥协和选择的结果。

题,分部门、分领域研究实力资源意义重大。下面就结合中国经济实力运用的实际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案例研究。

三、中国经济实力无法充分运用的原因

近年来,虽然中国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中国所掌握的实力资源与其应有的影响力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性。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引资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全球第六,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还是全世界铝矿石、铁矿石和铜矿石的最大消费者。但中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部分重大关切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没有被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导致中国出口商品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美国、欧盟、日本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海湾合作组织等双边自贸区谈判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稀土等大宗商品领域还缺乏决定性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企业走出去频遭安全审查,导致并购失败。

对这些挫折的解释有许多。一种是认为外部环境恶化,尤其是美欧等国内保护主义势力上升,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及中美、中欧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经贸竞争加剧等。例如,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由于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担心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造成冲击。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上述的很多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包括过分依赖出口导致在相互依存过程中的脆弱和敏感,以及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软实力不足等。第三种解释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缺乏运用经济实力、发挥领导力的意愿和态度,将中国称为“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对于所有超出自身领土范围的事项,中国力量的主要特点就是防御性——中国力量是用来说‘不’的”。^[4]姑且不论对错以及合理与否,这三种提法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和一个侧面进行解释。但笔者认为,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中国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经济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够或者运用实力意愿不足的问题,而是经济实力在国内转化和跨国流动过程中出了问题。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何使用这笔巨大的实力财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用于国内建设和民生改善,还是投资海外,买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厂房,变成绿地投资,从而避免由于美元贬值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在救助欧洲问题上,中国是否有可能通过联系战略,推动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事实证明,阻碍中国经济实力转化为现实影响力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拟根据前面两个部分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经济实力运用的视角,反思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尝试对上述一系列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作出解释。

(一) 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

不同部门间出发点和目标不统一、利益群体的出现和民众声音的渐强也许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这也为在新时期开展经济外交增添了新的难度。在旧有体制调整亟待推进之际,上述现象的出现导致实力资源在国内环节的损耗愈发明显。

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最丰富的实力资源是国内巨大的市场及其增长潜力。到2015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量将超过8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量将超过1.25万亿美元,累计近10万亿美元。这对经济萎靡不振的美欧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有步骤、以利益置换为导向、逐步开放国内大市场则可以转化为可观的权力结果和影响力。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从1986年中国

开始复关谈判到 2006 年入世过渡期结束的这 20 余年时间里,中美经贸关系之所以发展迅猛,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达成了一项战略共识,即相互确保市场开放、两国企业绝对收益的持续增长和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这一战略共识支撑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长达 20 年之久。但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在中美、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处理上,还是在推进多哈回合和几大自贸区协定谈判过程中,不同政府部门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有的部门强调开放,有的强调保护。各部门出于各自职责和目标采取不同的政策立场,这无可厚非。但客观来讲,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大规模的市场开放和经济体制调整阶段已经结束,这就给如何运用国内大市场这一实力资源开展经济外交带来挑战。只有在大规模开放市场或显示存在这一潜力和清晰轨迹的时候,经济外交谈判才能换取对方的对等开放。事实上,当前对外经济谈判面临的很多困难急需新的开放来解决。而美欧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形势萎靡,国内保护主义大幅上升,对中国保护主义表现尤甚。这对中国与这些经济体探讨双向新的开放构成了阻碍。此外,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是一步到位还是渐进升值,由于不同部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政策建议也存在差异。例如,负责对外贸易的部门可能较多考虑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出口,而负责金融的部门可能更多考虑金融体系整体改革目标的推进。出口企业可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因为这将抬高其出口商品价格,降低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而进口商和下游产业生产商则可能欢迎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会带来进口原材料价格的回落。就 3 万亿外汇储备这一巨大的金融实力资源而言,运用问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它们被兑换成为人民币,就会抬高国内的通胀水平和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压力。而将 3 万亿美元用于海外投资,也并非易事。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规模或流动性以吸收这笔巨额的财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西方。身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参与者,中国很难在摆脱损失风险的情况下实现投资的快速转换。而且,政府投资海外,国内可能出现批评声音,这些批评者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宝贵的遗产。^[4]

在微观和技术层面,同一政府机构内部对开放平台的选择也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例如,在多方贸易谈判和双边自贸区谈判优先顺序选择问题上,有的政府官员主张“多边主义”,即先推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而其他官员则主张加快推进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双边、三边或区域自贸区建设。“多边主义者”担心大经济体之间的“意大利面条碗”及其诱发的更多“面条碗”很可能会砸掉多哈回合的饭碗。“意大利面条碗”现象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下,各个协议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而“双边主义者”和“区域主义者”则从中国与美国、欧盟、东盟等几大主要经济体的战略型经济关系和双边整体关系出发,希望早日推进自贸区建设。

民间压力也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经济外交中的一大影响因素。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不仅仅是欧洲缺乏资金流动性,中国温州也因资金链条断裂而陷入一场民间信贷危机,一些企业关门倒闭。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民间骤然出现了“先温州后欧洲”的舆论压力,^[5]给中国领导人决策增加了新的考虑因素。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这一平常的援外活动竟也引发网上热议。一位网友表示:“援助别人我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坐的却是报废车,严重超载的面包车!”^[6]这些民间压力给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外交和内政是否会成为矛盾的对立面?是“内政优先”还是“外交优先”?是“国内优先”还是“国外优先”?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当前争论本身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投放构成了一定的钳制。

(二) 经济实力资源的流动性困难

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以撼动其他大国,因此中国可以倚重的实力资源主要还是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外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经济实力争取安全利益的实现,即通常所讲的“以经促政”。以中国争取西方国家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为例,中国尝试动用的实力资源主要是扩大进口,加强同主要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合作,^[7]即通过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来换取美欧在出口管制这一安全问题上的让步。但美国将放松出口管制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是高级政治,而将经贸问题视为低级政治。以经济合作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在推动西方国家放松出口管制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做出新的更大的努力。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要想让经济实力资源从经贸领域流入到国家安全领域,推动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似乎难度不小。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正如世界政治不是无缝之网那样,世界经济也不是无缝之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的结果相符,是有着现实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日本、德国甚至欧盟都很难真正崛起为强国的原因。

而且现实中,经济实力资源的流动还受制于国内不同目标之间的竞争。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利益的排序问题。是不是经济利益一定要服从政治与安全利益?如果是,经济实力资源就应该无条件地牺牲以换取政治与安全利益。例如在利比亚撤侨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中国工程人员的人身安全,及时将其撤回国内,从而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政治考虑优于经济考虑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国家动用(和牺牲)了经济资源,最终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目的(人员安全)。但欧洲一位研究人员则从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发现,“实践中,中国为实现单纯政治目的而对其经济影响力加以利用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且即使中国有打算这样做,结果也常常不遂人愿。在大部分场合,中国的表现都更像是个不愿出钱的出纳员;比起利用其经济实力换取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中国显然对其出资能否实现相应的回报,更加在意”。^[4]从上述两个对立的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目标孰先孰后、总体外交与经济外交是什么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政促经”还是“以经促政”。只有在明确了目标的先后顺序之后,才能确定经济实力资源与其他领域实力资源如何配合。在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经济资源主要服务于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整体外交目标。而在邓小平及其后时期,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前移,经济目标与外交目标孰先孰后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事实上,中国当前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中国会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观察。

此外,我们发现实力资源不仅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之间流动困难,即使同在经济领域,也存在不同议题领域之间流动困难的现象。金融领域的实力资源就不一定能流入到贸易领域。在救助欧洲问题上,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救助欧洲(利用中国的金融实力),推动欧洲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贸易问题“投桃报李”,难度非常大。原因之一就是欧盟内部负责金融的和负责贸易政策的不是同一个部门,且欧盟内部各部门协调难度很大。换言之,即使管理金融的机构因为中国援助欧洲获得了激励,这一激励也很难转赠给管理贸易的那个部门,因为欧盟的体制和决策程序决定了此渠道不通。这一案例反映的是不同议题领域不仅权力分配不同,而且权限分配、制度安排也存在不同。这是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实力资源流动性问题的一项补充。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只是发现了导致流动性困难的原因是不同议题领域的

权力结构不同,但中国在欧债问题上面临的利益置换困难则说明,导致权力资源流动性困难的还有不同议题领域的权限分配和制度安排的不同。

四、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实力运用的效果

针对上述经济实力无法有效运用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经济实力运用的效果:

(一)明确国家利益

之所以出现经济实力转化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关键是在国内进程中有关各方无法达成共识。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利益群体和民众当中多元利益和不同声音的出现,令国家利益越来越难以界定,模糊了经济外交努力的大方向。有鉴于此,应考虑成立国家利益委员会,研究中国在进一步融入世界过程中的国家利益问题,对其进行细化分类,指出什么是根本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定期出台《中国国家利益报告》,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决策时参考。在明确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有开放的渠道供不同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反映相关利益诉求,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国内各方达成共识,明确国家利益,对外谈判时才能统筹资源、攻守有度。

(二)运用战略

明确国家利益和目标之后,就应该运用各种实力资源及其组合达成这些目标,这就是战略制定。从实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和具体效果,中间需要战略、策略和手段。除了美国人倡导的“大战略”和“巧实力”这些宏观性战略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具体的战略,或者说是策略可用。例如“联系战略”,将议题A和议题B联系起来考虑,进行利益置换。中方可以考虑与主要贸易逆差国开展经济合作,扩大进口,通过共同努力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这些国家应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松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方便中国企业前往投资,为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这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联系战略。中国也可以考虑采用各方在WTO内部的谈判模式,即将多项议题组织起来,进行“一揽子谈判”,实施“大交换”。这样有助于实现利益总体平衡,对跨国谈判过程中国内利益受损的部门和团体进行补偿,从而有利于国内达成一致,并提高谈判的效率。此外,中国与美国、加拿大开展了“省州合作”,即中国各省与美国、加拿大的州、省开展经贸合作,既推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地方层面上的经贸合作,又赢得了地方政府和民众对两国开展中央层面经贸合作的支持,从而提出了一个很新颖也很管用的经济外交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动员对方地方力量做联邦政府的工作,是一种“自下而上”、垂直运用实力资源的新方法,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实践和推广。

(三)加强内部协调

在明确国家利益和制定战略过程中,关键是做好内部协调。是自上而下,从总体外交的高度出发,妥善处理总体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系,既不能唯经济利益论,也不能单纯强调为了外交利益就应该牺牲经济利益,而应辩证地看待国家利益并予以细化。同时加大在经济领域的内部协调力度,通过各领导小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制度等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实力资源,统一对外谈判立场。二是自下而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与世界关系的大讨论,以形成新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共识,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发展应该强调两个重点,对内“以人为本”,处理好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矛盾较集中领域的问题;对外妥善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反哺国内发展,推动

国内形成继续改革开放的共识。实力资源只有通过内外兼通的路径,才能稳步积聚和有效利用。

(四) 加强对外战略机制和平台建设

在与国外互动过程中,通过设立机制化平台,创造性地解决各类实力资源如何配合的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是朝向实现经济资源与战略、政治资源有效整合的重要步骤,为中美双方的高层官员共同管理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平台。战略经济对话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能将两国高层官员集聚一堂,就双方关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政治与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双方的这些高层官员既负责国内政策也负责对外关系,因而能够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评估政策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进程中的影响。由于战略经济对话汇集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双方领导人从全局利益出发达成的战略目标能够通过这些部门予以落实,从而防止局部行业利益或个别部门利益主导国家整体经济政策和总体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目前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尚不能有效整合各类实力资源,战略轨道与经济轨道尚没有完全对接。为了推进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在元首层面达成战略共识,再交由战略与经济对话具体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应实现政治与经济议题的结合,实现全面的有取有予。与此相类似,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会晤机制以及“一揽子贸易与投资合作”^①等都是具备将各类实力资源整合使用的潜在平台和机制,但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尤其是通过内部协调,明确国家利益,统一谈判立场,加强对外沟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上述战略机制将发挥基础性的平台作用,而战略机制的动力源泉依然是明确国家利益、凝聚国内共识、整合实力资源、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利益置换。

参考文献

- [1] [美] C. P.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56, 65.
- [2] [美]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M]. Double - 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eds Peter B. Evans, 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436.
- [3]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2.
- [4] [比] Guy de Jonquieres. What power shift to China? [J]. ECIPE Policy Briefs, No.04/2012.
- [5] 白明.先救欧洲,还是先救温州? [EB/OL].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04-25141.shtml, 2010-10-07.
- [6] 凤凰网.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引发网上热议[EB/O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gsyeyxi/aochechehuoc/content-3/detail_2011_11/27/10929244_0.shtml.
- [7] 新华网.胡锦涛: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12/11/c_122406371.htm, 2011-12-11.

[责任编辑 许佳]

^① 2011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巴厘岛会晤时也提出关于推进中美贸易投资一揽子合作计划,包括扩大进口、促进双向投资增长、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和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n East Asia and Revelation: Case Study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Singapore

LIU Shu XUE Zhong-yi · 71 ·

Abstra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health of national party politics.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people in East Asia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unning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party politics in East Asia. Although the mod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Republic of Korea (ROK) and Singapore are different, they have covered the main mod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and experiences to follow: fully playing the dynamic role of parties, taking a flexible way to communicate, broadening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ctively, and so on. Learning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s ruling party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 parties in East Asia; peop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elation

Reviews on the Security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GAO Ke · 79 ·

Abstract: Strategy is the planning and guidance on global, high-level major issues of a state or government. However, policy is the guidelines for action to realize the route of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by the state or party. After coming into power,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faced with new changing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s a new party with no experiences in governa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should only follow the policies of the LDP government in strategic level. As a result, there will be no sudden change. Since 2011, due to the tough situation of Korean Peninsula, frictions of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Russia-Japan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 are new uncertainties in Northeast Asia. The security polic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is facing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ase, new policy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re unavoidable. Noda, the Prime Minister, his character and sleek way of doing things will increase the uncertainty for Japan to get out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dilemma in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Japan; the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alliance; relationship; problem and challenge

On the Use of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ZHANG Xiao-tong WANG Hong-yu ZHAO Ke · 91 ·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s caught up in a new dilemma: having unprecedentedly rich power resources while fac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ituation.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lies in 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in transforming economic power resources into concrete results. The eros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 domestic process and the difficulty of transporting power resources across se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in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resources into results. Only by clearly delinea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omprehensively employing both grand strategy and tactics, more closely coordinating internally 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strategic dialogues mechanisms can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be properly wielded.

Key Words: power; power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strength; economic diplomacy; power resources; domestic process; strategy; linkage strategy; grand bargain

Thinking o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Jili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Reforms"

LIU Guo-bin ZHANG Dong-shuang · 99 ·

Abstract: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aking the "Three Reform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For Jilin Province, advantages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rapid growing county economy,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 status of agriculture, inpu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tc. On the other hand, disadvantages are as follows: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bsence of the institution of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lack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weak agricultural R&D ability, and etc.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Jilin Provi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aking the "Three Reforms" as a whole.

Key Words: "Three Reforms"; overal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Jilin Province

Geomantic Culture of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 Comparative Study

LI Qi-ke CAO Xing-sui · 108 ·

Abstract: Geomancy is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eomantic culture of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ROK), which is deeply affected by Chinese Geomantic culture, is quite different. Rooted in traditional Yi culture, the Geomancy of the three countries has distinct features of Physiocracy and plain thoughts of cultivation. Besides, thoughts of architectural ecology and architectural esthetics are concluded, and ec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humanity implication is varied. Geomancy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s utilitarian, ecological and systemic in common. Howev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mantic Hypothesis and Geomantic Omen, different features among the three can be easily found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Comparative study of Geomantic cultur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s beneficia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 of Han culture in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Geomantic culture; Geomantic Hypothesis; Geomantic Omen, Sino-Japan-ROK; comparative study